

中菲经贸“拥抱春天”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刘国民

3月6日至9日,新任商务部部长钟山首次外事访问选择了菲律宾。3月7日,中国—菲律宾经贸联委会第28次会议在马尼拉举行,重启了这一中断6年之久的重要经贸磋商机制。钟山3月11日下午在“两会”新闻中心答记者问时说,此访主要任务是落实去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访华以来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菲经贸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他也拜会了杜特尔特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中菲两国经过了漫长的“寒冬”,终于迎来了“春天”,我们要拥抱“春天”。据悉,国务院副总理汪洋3月中旬访问菲律宾期间,中菲将正式签署《中菲经贸合作六年发展规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周士新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可以从“两个时间点”和“一个新台阶”入手理解中菲关系。

第一个时间点是冷战结束,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不如从前。周士新说,菲律宾过去长期做美国

的盟友,在安全方面能得到一些好处。但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在美国眼里失去了往日的重大战略价值,美国也看不起菲律宾这个“小兄弟”,美日对菲律宾经济发展也不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经济还过得去,但冷战结束以后菲律宾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其它东南亚国家。

第二个时间点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阿基诺三世下台。周士新分析,阿基诺三世2010年6月到2016年6月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多次在南海掀起风浪,导致中菲经贸关系受挫。这一局面在去年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发生了改变,中菲关系逐渐回暖。舆论称商务部部长钟山访问菲律宾是“时隔6年首位中国部长访菲”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新台阶”是指中菲两国关系(包含政治、经贸、文化等)走上全面发展新台阶。中菲两国产业结构本身具有互补性,菲律宾基础设施亟待完善,比如说迫切需要修建道

路。菲律宾也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商务部部长钟山和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3月先后访问菲律宾,表明了中方想把双方经贸关系恢复发展起来的愿望。考虑到过去中菲文化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去年以来两国政治关系也改善了,如今两国经贸关系也明显改善,今后的中菲关系就能够两只脚一起走路,会更加平衡,为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

菲律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为东南亚其它国家作出了表率。周士新所说的两国经贸关系新台阶,有外交部部长王毅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列出的数字为证:去年10月份到现在还不到半年时间,中国到菲律宾的游客团组数量新增将近1000个,进口菲律宾热带水果20余万吨。

杜特尔特在会见钟山后也表示,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已翻了一倍。中国向菲律宾购买的香蕉、凤梨、芒果数量增加一倍,中国还要买酪梨。中国对这些农产品有大的需

求量。

不仅是农产品贸易前景广阔,国内汽车行业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菲律宾汽车市场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车企可以尝试进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改善,经贸方面的文件认证等手续肯定会更顺畅。”该工作人员还提到,“考虑到东盟对中国的关税,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去菲律宾设厂,避开关税之后利润空间会更大。”

钟山访问菲律宾取得的另一项成果是,鼓励中方企业对非投资,包括几家央企对菲律宾约10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合同,积极参与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工程;双方还商定在菲律宾共建工业园区,以帮助菲律宾加快推进工业化。这中间潜藏的商机得到了企业界的证实。据中国一家电力建设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随着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改善,企业的投资空间会变大,菲律宾现在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很多中国企业涌入想抓住这个机会。

“一带一路”建设：经济环保兼顾 论坛凝聚共识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耿国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是快速的,成果好于预期。倡议已经得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响应,我们已经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将近50份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还包括70多份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同时我们经过共商,推动共建了一批标志性的合作工程,比如印尼的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老铁路、还有一批港口和其他设施等等,从现在的进展情况看是良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

在两会期间,“一带一路”建设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日前,商务部合作司发布了2017年1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统计数据。1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3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0.6%,主要投向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俄罗斯、蒙古、伊朗等国家(地区)。从2016年整体水平来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5%;2016年1月,这一比重为9.7%。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投资比重的增加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彪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实体经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在国际贸易增速不断下滑的今天,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提案中建议,生态产业完全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继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另一个抓手。

“从自然生态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环保产业空间极其广阔,需求相当强烈。但同时,沿线国家大多严重缺乏核心生态环保技术、相关产业经验和资金。”王文彪在提案中指出,中国的荒漠化生态治理模式已经得到国际认可,相关生态环保企业有机会、

有实力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王义彪在接受采访中时说道,“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经济不是很发达,但就像我们的青海省一样,发展经济并不是唯一的目标,还要寻找到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平衡。”

为支持我国生态企业“走出去”,王文彪在提案中建议:由商务部、科技部、环保部等部门牵头,组织有实力的生态环保企业,组成掌握核心生态技术、优势互补的企业集群,前往沿线区域投资发展生态产业;由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部门牵头,组织协调生态环保行业相关力量,建立稳定的“请进来”、“走出去”国际交流机制,针对性邀请相关国家生态环保核心官员、人士考察访问中国生态示范企业和示范区,组织中国生态企业赴沿线国家考察交流;支持中国企业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成立民间的“一带一路”技术、人才、产业合作平台,以此带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合作。

即将于今年五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吸引了世界关注。“论坛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中介绍道,“高级别会议简称‘1+6’,‘1’是主场会议,‘6’是六场平行主题会议,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和智库会议。”

“这个论坛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王义彪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还不是很了解,还存在一些诸如中国转移落后产能的误解,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打消疑虑。”将“一带一路”建设积极与国别、区域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本次论坛将通过白皮书或者宪章的方式,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将倡议转化为机制,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好愿景和路线图。“除了落实之外,本次论坛也会在资金融通方面寻找一些新的模式,创新融资平台和理念。”王义彪表示。

用更多公共产品 引导全球化走向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刘国民

尽管经济发展与全球化伴随而生,全球化有效整合世界各地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但是,近两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在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看来,目前全球化正处在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关键时刻。

近日,《中国贸易报》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他说,2001年WTO(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很深远。WTO多哈回合谈判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张贸易多边主义,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之后西方国家逐渐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过去20多年它们是在全球化中的相对利益受损者,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受益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更是表现出从区域主义走向单边主义的倾向。

面对上述情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仍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

李向阳认为,这些表述说明“中国仍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推动者”。中国坚定推动全球化的举措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经济全球化新理念,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全球化应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没能解决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一课题,为全球化贡献了理念性公共产品。

二是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主张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对外签署自贸协定。数据显示,我国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上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主张开放的区域一体化。

三是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导向的,不预先建立规则,能够积极缓解传统全球化存在的发展缺位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化贡献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式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从周汉民委员的两会发言来看,“更加积极地倡导多边投资协议谈判,充分回应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呼声,消除市场壁垒,保护发展中国以及东道国必要的自身利益,形成更全面、更高标准并且可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多边投资规则”,就是中国接下来可以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引导全球化走向提供的公共产品。



图为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的第51届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展区的工作人员向一名参观者介绍中国的旅游资源。3月8日,第51届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国展团以“美丽中国”为主题,在展会上推介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别具特色的旅游产品,让更多人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构建自贸区网络 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迟福林讲道,推进“一带一路”进程,要以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建立多层次、多种形式自由贸易区网络为重要目标。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核心,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已经覆盖了44个国家。通过探索实行基础设施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无缝衔接”,为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签订了各种相关合作协议,但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尚未取得大的突破。

“我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建立多种形式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对条件成熟的国家,采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实行基础设施项下、产能项下、旅游项下等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安排,以实现双边自由贸易的突破。”基于此,迟福林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探索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网络。比如,加快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进程,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中多边自由贸易区典范;打造“10+1升级版”,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进程;把形成灵活多样、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作为推进与中东欧(“16+1”)合作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二,把跨境经济合作区和产

业园区提升为自贸区。我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议将“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上有条件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升为自由贸易区,消除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推进资金流、物流、人员流动的便利化。一是依托中巴经济走廊,逐步将瓜达尔港打造成以能源资源储备加工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区;二是依托中俄蒙经济走廊,推进以能源矿产电力等产业为重点的中俄、中蒙跨境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三是把黑龙江绥芬河、云南临沧等跨境经济合作区上升为跨境自由贸易区。

第三,构建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圈,对产业项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先行先试。

在能源、旅游、医疗健康、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建立广泛的经济合作圈,提升双向开放水平。比如,与沿线能源生产国签订双边、多边能源自由贸易与合作协议,稳步推进能源项下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合作,加强能源安全合作,深入推进能源技术合作,构建“一带一路”能源治理新机制。

“我们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免税购物、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目下的自由贸易试点。”在迟福林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重要的突破口之一是在旅游、医疗健康、能源等产业项目下推进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进程。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新疆如何从开放“末梢”变“前沿”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新疆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末梢’变成‘前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部双边处副处长海丽曼十分关注近几年新疆的快速发展。

“兰新高铁建成了,新疆迈入了高铁时代;开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格鲁吉亚、德国等国的新疆西行国际货运班列成功运行,大幅提高了经贸合作效率;巴基斯坦哈比银行、世界第一大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集团落户新疆,特变电工、广汇集团等新疆企业的境外项目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成功落地,新疆对外经贸产业合作正在不断深化。”海丽曼讲道,这些都是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不过,新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与周边地区合作体制机制亟待创新,对外通道不畅通,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着新疆成为连接欧亚的枢纽。

海丽曼以环阿尔泰山“四国六方”合作机制为例讲述了为什么与周边地区合作体制机制亟待创新。环阿尔泰山“四国六方”合作机制自2000年倡建以来,涉及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哈萨克斯坦州、蒙古国科布多省和巴彦乌列盖省等六个行政主体,总面积约78万平方公里,507万人参与。由于该机

制仍停留在地方层面,缺乏四国中央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后期发展动力不足,合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我们建议,将环阿尔泰山‘四国六方’合作机制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俄哈蒙三国积极开展外交沟通与协调,使其成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平台。”海丽曼说。

此外,新疆对外通道不畅通问题也给新疆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带来困难。海丽曼一项一项将我们列了出来:铁路方面通道单一,除哈萨克斯坦外,与周边其他国家尚无铁路相连,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建设无实质性进展;信息通道方面,新疆与多数邻国之间的通信和信息传输需要通过东

部沿海的国际海底光缆中转,通信距离长、成本高;口岸方面,在对外开放的17个口岸中,只有8个是面向第三国开放的口岸,卡拉苏、红其拉甫等5个一类口岸只能季节性开放,口岸综合配套设施薄弱,信息化程度低,功能不完善;吉克普林等部分口岸尚未开放,新疆与俄罗斯双边贸易只能通过第三国转口,延长了运输时间,增加了交易成本。

面对这么多难点,有没有解决办法,她说:“希望成立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建设推进工作组,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协调,研究重大问题,推进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将中巴

铁路、中吉乌铁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丝绸之路基金投资范围,并给予融资支持。”

“现代工业基础仍然薄弱,产业体系不健全,总体规模偏小,缺乏高端产业发展平台,金融、物流、研发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低,新疆需进一步加强自身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海丽曼还建议,国家加大中央财政对新疆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转移支付力度,加快红其拉甫、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一类口岸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口岸功能。通过外交途径,积极推动吉克普林口岸(对俄罗斯)、乌什口岸(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开通工作。